



[美] 托马斯·鲍斯泰尔曼 著
乔国强 乔爱玲 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从人权到经济不平等的全球史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从人权到经济不平等的全球史

〔美〕托马斯·鲍斯泰尔曼 著

乔国强 乔爱玲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人权到经济不平等的全球史/
(美) 鲍斯泰尔曼著; 乔国强, 乔爱玲译. —北京: 商
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321-2

I. ①二… II. ①鲍…②乔…③乔… III. ①世界史
—现代史 IV. ①K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105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从人权到经济不平等的全球史

[美] 鲍斯泰尔曼 著

乔国强 乔爱玲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1321-2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5/8

定价: 42.00 元

前言与致谢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已的历史。我的历史大部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形成的,1970 年那年我才十二岁;到 1980 年时,我二十二岁。在这段时间里,我把很多时间用来打篮球,热爱文学,离开家庭,开始干了几份工作,结交了几位女友,还花了点时间搭便车旅游,然后就从高中和大学毕业了。我长大成人了。20 世纪 70 年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人们只是从橙色长绒地毯、聚酯服装、通货膨胀和全国性的不安定中幸存下来。对我来说,也包括目睹了那些有权势者的腐败行径被揭露,学会了热爱户外生活,认真地探索起精神方面的东西,而且还接受了我认识的半数人——妇女,为了平等和尊严所作的斗争——这可真是件令人释怀并为之振奋的事情。同时,我也学会了用政治眼光来看待问题:眼睛紧盯着权柄,看清楚是谁在掌权,这些掌权者是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力,谁在受益,谁不受益。在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年代”里,有些人转身离开了公众生活和政治,而我却对此着迷。

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在这十年里,我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南部、新英格兰以及西方世界。我在意大利待的日子久一些,还去拜访过墨西哥、希腊和英国。数年后,中国让我大开眼界。我一路上享受着永恒的友谊,这不可避免地 为 20 世纪 70 年代增添了一些积极的色彩。我很幸运,住在世界上

最美丽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另一个是加利福尼亚的落叶湖。用加拿大歌词作家布鲁斯·考克伯恩的话说，“被蜿蜒起伏的群山之美所割伤”，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从伤痛中彻底恢复过来。我的70年代鸿运当头，跌跌撞撞地获得了威严、爱情以及恩典，这让我感激不尽。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年代。在那个年月里，我得到了许多帮助，尤其是来自家人的帮助。那时，我的大哥，约翰·鲍斯泰尔曼，给我的教诲最多。从那时起，每当我们一起反复思量那十年我们所走过的一些坎坷的道路，他是与我开怀大笑最多的人。我的二哥，迈克·鲍斯泰尔曼，如我父亲所说，“在反主流文化盛行之前，他就开始反主流文化了”。然而，他实际上比我所认识的那些人举止更为优雅，心地更为善良，他可能永远都无法想象他给了我多大的帮助。我的姐姐，南希·钱德勒，给了我鼓励，并为我树立了一个坚强、独立、脚踏实地的好榜样。我的父母，珍妮和劳埃德·鲍斯泰尔曼——现在两人都已过世了，让我们思念不已，给了我们一个家。这个家充满了活力，富有文化气息、宽容和大度。对于我这个历史学家而言，他们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的根基。我的妻子，林恩·鲍斯泰尔曼与我同岁。虽说我们直到1986年才相逢，但她在70年代的经历与我的经历大致相同。我们在一起交流彼此的情况，如今已长达二十五年之久。没错，我们甚至有可能在70年代那十年后半期的某个时刻，在校园的路上或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大学——我的家乡，也是她就读的那所大学所在的小镇，偏僻小路上的某个地方擦肩而过。

一些审读者帮我提高了这本书的质量，把我从许多令人尴尬错误的泥沼中拯救出来，而且还迫使我重新思考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将在后文最精彩的部分里看到他们参与的结果。本书中出现的任何错误，责任都不在他们，因为那些错误都是我一意孤行地选择不接受

他们的建议所致。约翰·鲍斯泰尔曼和伊莱恩·泰勒·梅非常慷慨，他们仔细地梳理了这部手稿，并都为此付出了满腔的热情和深刻的智慧，汤姆·班德和一位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匿名审读者也为我提供了异乎寻常的帮助和富有真知灼见的反馈意见。苏珊娜·梅特勒从一开始就为此书喝彩，同时让我在修改此书中分享了她政治学家的智慧。安德鲁·普莱斯顿给予了善意的支持和详细的建议，史蒂夫·威尔伯恩也是如此。戴维·潘特在石油问题上让我绝处逢生。丹尼尔·萨金特、杰弗里·恩格尔、肯·奥斯古德和卢·艾恩伯格邀请我分别在哈佛大学、得州农工大学、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以及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把本书的几个方面分别讲给大家听，让我得到了富有创见和挑战性的回应。我的那位干练的代理人，即加拉蒙事务所的丽莎·亚当斯，帮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布丽吉塔·范·莱因伯格、萨拉·伍尔芙以及其他员工们共同捍卫了他们专业性和效率的信誉，文字编辑凯伦·沃德帮我纠正了一些错误，内布拉斯加州大学为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金支持。我非常感激苏珊娜·梅特勒、丹尼尔和伊丽莎白·尼尔森以及那些与我生活在一起的人——我妻子林恩和我们的儿子丹尼和约翰，他们对本书作者及本书的完成给予了关心。

对于一个历史学家而言，研究新近刚刚过去的一段历史具有特殊的挑战，我们的视角必定是受限的。如果说新闻报道是历史的第一手资料，那么当代历史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第二手资料。过去的历史往往随着我们的视角变化而变化，因此，时间的流逝才是深化我们理解的关键。我们对20世纪70年代的看法，将不可避免地随着未来的发展而不断地演化。不过，这个十年已经结束三十年了，这段时间足以就当时美国和世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意义开启一些新的视角。

起初我为写这本书做了一些研究，结果发现与我所预期的并不完全一致。在常见的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的历史版本中，主要讲述的故事是衰退、不确定性以及以自我为中心。我知道这些故事中有许多是真实的，不过，这么说似乎还是有些不妥——因为这显然与我所经历的那个充满活力、令人激动且富有争议的时代不一致。所以，我去寻找我认识的那些乐观的改革者：女权主义者、环境主义者、福音派、新移民和其他人。我找到了他们，于是他们便成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我也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公民的信念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从政府转向商业，公共政策也在同一个方向上发生了转变。我偶然还看到了这样一则国际上流传的故事，其故事脉络大同小异，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背景。这些发现使该项目不再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世界综合史，而是在全球背景下对美国历史的诠释。

其结果是，这本书是由发现的证据而构建起来的，而并非受限于本研究伊始所关注的内容。我的目标是再现真实的历史，所有出现在这段历史中的人物，读到本书都会从中辨别出自己的身影和自己曾满怀信心提出的观点。当然，我对于这段历史核心中的一些发展变化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又不可避免地构架了对 1973 年至 1979 年这段历史的描述。不过，此书的目的不是引发争论或给出政策建议，而是为解释近期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变所做出的一番努力，其中也掺和进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弄清现在，才能决定如何去书写它们，要求理解过去，而非为迎合我们自己的好恶而试图重塑历史。

托马斯·鲍斯泰尔曼
于内布拉斯加州林肯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逆潮流危机	19
国外的动乱局势	22
国内的腐败现象	34
保守主义与对政府的不信任	43
经济的不稳定	51
转向内在	62
第二章 平等与民主改革潮流的兴起	71
公共领域里的女性	74
私人领域里的女性	87
许多平等的前沿领域	95
政治改革	107
阻力	112
第三章 市场价值的传播	121
原则的显著变化	125
经济南下	132

全球化一体化的提速	136
从公民权到撤销管制	144
对所有问题的市场解决方案	152
市场更加自由，文化更加粗俗	162
第四章 帝国的退却与市场的全球推进	174
人权的出现	177
欧洲帝国与南部非洲	184
苏联帝国	191
美利坚帝国	198
国家的退出	205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	210
第五章 抵制新型超个人主义	216
环境主义的挑战	220
美国国内的宗教复兴	237
吉米·卡特：时代的男子汉	248
第六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大致平等	256
相反的证据	259
包容性的提升	266
市场的持续	274
无限制的消费	278
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	285
结 论	291

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这十年的名声不好。一部颇受欢迎的卡通片《杜恩斯比利》里的一个人物，将这十年称为“肾结石的十年”。一些生动的事实说明，随着美国陷入了经济衰退、政治腐败和军事紧缩的泥潭，国家核心机构似乎在日益崩溃瓦解。最后一批美国战斗部队垂头丧气、士气低落离开了越南，这是这支武装部队新经历的一个结局，与 1812 年战争和朝鲜战争相类似。这支武装部队除了对失败有所体验外，对胜利没有什么经验。从东南亚到巴拿马再到伊朗，美国正逐步从诸多国际事务中退了回来，或者说影响力下降，美国公众失去了对国家领导地位的信心。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丑闻令总统职务蒙羞，成为这个国家第一个辞职的首席执行官。杰拉德·福特无法克服他那继任总统身份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因而不能以自己应有的权利当选新一届总统，而吉米·卡特则未能赢得连任。

这三位总统都没能使国家日益黯淡的经济前景变得光明起来。世界原油价格增加了八倍，加剧了因越战开销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两者的合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并导致出现新的“滞胀”困境。美国人对他们家庭经济前景的信心下降了。1975 年，美国最大城市纽约濒临破产，两大政党没有一个能拿出令人信服的方案来解决国家的严重问题。福特来自密歇根州，长期担任美国国会议

员，他还能回想起自己初次当选众议院新议员时听到哈里·杜鲁门总统把国情说成是“很好”时的情景。1975年1月15日，轮到福特做一年一度的总统的演讲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的国情状况不太妙。”

如果说这个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机构在20世纪70年代停摆了，那么私人生活和公民文化似乎同样会被混乱和失败所破坏。家庭这个美国社会的传统基础也在离婚率的飞涨中破裂。这一变化给成千上万的人们带来了解脱和安慰，但也为许多妇女、儿童造成了心理痛苦，并致使她们的活力大幅度下降。另一种抒发不满情绪的标志是人们广泛使用成瘾性药物，其中有合法的，如酒精和处方药；也有消遣性的，如大麻和可卡因；再到极具破坏性的毒品，如海洛因。一位无党派批评家曾讽刺挖苦道，福特和卡特入住白宫的事实本身，实际上就是“对当时猖獗地滥用药物做出的一种合理解释”。还有一种表现不确定性的标志是，高校学生赞同考试时“道德上有义务不作弊”这一说法的比例明显下降。回想起来，文化品位的一些基本问题似乎也受到了重创。为何追求长绒橙色地毯、聚酯长裤、宽领带、“笑脸”标志，以及迪斯科音乐等，对当时及至今天的许多美国人来说是神秘的。只有电影似乎有所改善，艺术创造力常常与骚乱和不确定时期相关联。回想起过去的十年，那时人们把这十年看成是充斥着“糟糕的发型、糟糕的服装、糟糕的音乐、糟糕的设计、糟糕的作品、糟糕的经济、糟糕的地毯、糟糕的布匹，以及大量糟糕思想”的十年。作家乔·昆南写道：“普遍的感觉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弯完全转错了。”

历史学家和其他分析家们以同样的方式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基伦在他那本标题就颇为发人深省的书，即《发生在1973年的精神崩溃》一书中声称，这十年实际上

就可以看作是“衰弱、混乱和不适的同义词”。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是一位普利策奖的获得者，他曾悲叹道：“幻灭的政治与猖獗的大众文化二者之间的奇怪融合，让20世纪70年代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风味。”贝丝·贝利和戴维·法伯是这些年来最优秀的两位历史学家，他们认为这也许是“我们最奇特的十年”，一个充满了“不合逻辑的冲动，自相矛盾的欲望，甚至是大量自我鞭挞”的时期。菲利普·詹金斯和戴维·弗鲁姆等观察家把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描绘成一个处在文化焦虑和道德沉沦痛苦中的国家。另有一些观察家则强调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社会信仰普遍迷失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众所熟知，那是一个极度令人沮丧和易被遗忘的十年，是一个大部分美国人都愿意看到它终于结束了的十年。

就时间顺序而言，20世纪70年代前后只是问题的一个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里，极强的改革力量、令人激动的社会与政治冲突以及重大的国际事件，共同构成了清晰的几条历史主线。这两个十年也都经历了可观的经济增长和相当小的通货膨胀，从而使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的未来前景抱着极大的信心。这两个十年都出版了大量的文学回忆录和历史分析结果报告。对于20世纪70年代来说，这有点类似于具有历史头脑的北卡罗来纳的居民所面临的老问题，他们把自己的州看作是处于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两座自高自大山脉之间的谦卑峡谷”。70年代的状况与此很类似，落在两个“名副其实的”十年之间的低谷之中。不管怎么说，在这两个十年中，还是出现过一些重要的运动和重大的事件的。

然而，经仔细推敲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这十年原来是个改变和调整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期间，美国历史乃至此后世界历史的框架均得到了重构。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挑战引起极大关

注的表面下，有两股强大的暗流在涌动着。一股是平等主义与包容精神，二者摒弃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权力设计，宣称人人平等，尤其是妇女、男女同性恋者、有色人种和残疾人的平等，也就是说，追求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平等。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种种变革”实际上发生在70年代，连动物也能在1973年颁发的《濒危物种法》这个具有包容性的愿景中，找到一个位置。

第二股强大的暗流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决定性转向，这一转向被视为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首选方式。早在1980年选举罗纳德·里根出任总统之前，美国人在政治领域里的信仰就发生了转变。人们从相信自己会在政府干预和集体行为中受益（“新政”秩序最后在60年代实现了“伟大社会”计划），转向信任更加纯粹的市场价值，并以此作为实效经济和公平社会的关键。随着帝国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蔓延，平等主义和市场价值这两股暗流，在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各地起到了极大的牵引作用。因此，在这十年里，美国是世界更大范围里的一个典型的部分，而不是例外。虽然有时彼此不尽相同，但平等主义与市场价值观却合力催生了纯粹个人主义和消费者资本主义，并受到了买卖双方的欢迎，不过，落后者却因此而遭殃。

这些年标志着美国的社会转型。虽然数十年后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影响，但是，这一转型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就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完全接受了两个意义深远但在某些方面却又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形式上的平等和对市场的完全信任。总之，这些典型的美国信念创造了一个平等对待每个人的社会，同时也加速催生了不平等，其结果是超级利己主义的出现，即为了追求个人优势和幸福，人人都可以而且应该参与竞争。美国人通过实例及其影响力，向全世界推广了这种说法上的平等和行动上的不平等的组合体。

在 1970 年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生活，特别是公共领域中的生活，变得尤为多样化和极具包容性。除了美国之外，再也没有哪个强国——当然也没有主宰世界的力量——是被其祖先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塑造成这个样子。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形式上平等的文化，女人与男人、男女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白人与有色人种、身体强壮者与残疾人等，都能得到官方的平等对待。公然歧视是非法的，并会遭到广泛的谴责，“种族主义者”成了最糟糕的代名词。如今，女性办大公司，在最高法院里就职；研究生和职业学校里也有一半是女生，本科院校里的女生人数更是占了一大半；非裔女政治家成了这块土地上最高职位的主要竞争者。当然，私下的偏见以及现实中的负面影响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这是苦涩的历史遗留下的痼疾。时值新千年，在美国公开场合里，只能偷偷摸摸地表达偏见，而这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生活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美国人被时间机器带向未来，定会被当代美国社会的平等主义和包容态度所震惊。

对市场充满信心的美国文化与对平等的承诺是并行不悖的，人们对供求机制的信心取代了对政府管理的信心。服役美国军队的全部都是志愿者，而不是从所有合法公民中征集而来。取消对企业的管理——航空公司、银行、信用卡公司——得到了两大政党的支持。福利条款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支持：根据主流政治观点，人们应该依靠自己，兴衰由命。税收和社会支出明显保持着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美国人普遍相信凭借启用利润激励机制，有效地生产所需要的一切，市场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整个政治领域里，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私下里主要关注的还是美德和效能，而政府公共部门则不得不继续维护自己部门的利益及其预算。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期间，所实施的“新政”和满怀心地利

用信奉行动主义的联邦政府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对市场充满信心的后果却是复杂的。市场的逻辑是为人们提供他们想要的一切，无论是沃尔玛出售的廉价玩具，还是已发展成庞大产业的网上色情与赌博，都是如此。21 世纪的美国文化变得越来越粗俗，人们公开说脏话，就连性交和暴力也公开化了。对消费者个人选择的推崇助长了这一切，这一点只要到任何一家影城看一看就可得到证实。市场的唯一的道德就是效率，自由市场这个字眼，无论如何都不会含有“保守”的意思。通过经济交流，毫无制约地追求利润所带来的是经常性的，而且常常是残酷无情的变化，而并非保护了什么。美国铁锈带的生产基地和就业机会，转到了太阳带^①和海外一些生产成本较低的地方，这一现象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小企业主对大公司连锁商店所带来的极大变化了若指掌。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给这种动力起了一个著名的名称，即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不管怎么说，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确一直都是最伟大的变革力量。由于社会和宗教保守人士关注的是，如何维护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和塑造品行端正的公民，因此个体消费者毫无节制的放纵就会被视为令人厌恶的事。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一代中，共和党通过把社会保守派和信仰自由市场这两大翼人士团结起来的方式，在美国政治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不过，两者之间固有的张力在 2008 年的总统初选时再次重现，而且看上去不可能完全消失。70 年代后，弥漫于美国政治的保守主义观念更倾向于自由意志主义而非清教主义。

其他方面无论是好还是坏，给市场力量松绑的过程加深了 20

^① 铁锈带是美国传统工业衰退地带；太阳带是美国新兴工业发展的地带。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所加。

世纪 70 年代后美国经济的不平等。实际上，社会越是力争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现实就越是不平等。事实上，正是这种所谓的包容，为经济上的不平等提供了某种遮掩。减少歧视似乎意味着，如果个人境况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那也是他们自己所造成的，身份政治不再支持阶级的差异。我们的任务是研究不断增长的平等与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这一悖论现象，并解释这种现象是如何重塑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和世界。

常言道，年表是历史学家的最好朋友。往昔随着时间流逝展现了出来，因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则是历史学家主要挖掘的对象。然而，任何一段特定的历史，一旦脱离了时间的框架便充满了挑战。在目前的情况下，专注于 20 世纪 70 年代这十年的逻辑似乎已够清晰的了。不过，经仔细研究又会发现，这个逻辑又会变得难以捉摸。没有哪种魔力会附着在以零结尾的数字上，人民生活和重要趋势的呈现，与这几个十年的开始与结束并无多大关系。整理近年历史还有许多其他的办法，如采用不同标准：1965 年至 1973 年为美国越战正式展开时期，1969 年至 1977 年为共和党统治白宫的年代，抑或说，1979 年至 1985 年为恢复冷战时代。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各有自己令人信服的理由。作家路易斯·米南德辩称：“在理清美国的政治和态度时，以十年为标准划分阶段极其令人烦恼。”

事实上，1973 年至 1979 年这一时段，才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心阶段。像草原上一连串呼啸而过的暴风骤雨，在 1973 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挫折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人，使他们不知道经过了前面那场强大的暴风骤雨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天气。美国军队从越南撤了出来；在众多弹劾总统的呼吁声中，掩盖“水门事件”丑闻的企图败露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开始禁运石油，与

此同时，尼克松把美元从金本位中剥离出来，维持了四十年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计算通货膨胀之后）首次下降。安德烈亚斯·基伦写道：“这诸多事件中的任何一个事件，都足以挑战美国自身的形象。”这些事件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对国民心理的猛烈一击。一些来自国内的打击发生得早一些，例如几次暗杀行动和发生在1968年的战争抗议活动，许多激进的年轻人开始大肆谈论革命。这些打击淡化了民族的凝聚感，也放松了对世界未来走向的预见。显然，1973年的恶劣天气正在来临，并且还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每一个人多少都会受到点影响。在随后的六年，暴风骤雨还在持续降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在三英里岛发生的几近核灾难性的事件。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彰显了这个时代的特色，最重要的是，美国人越过一个分水岭，进入了一个新的流域，贝丝·贝利和戴维·法伯精明地将其称为“富有成效的不确定性”。

新的不确定性如何富有成效，一时还搞不清楚。尽管许多家庭能够挺得住——他们把更多的家庭成员，十几岁的孩子，尤其是妇女送进了有偿的劳动力大军中，但是，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多半是让人们变得更穷。极少有人到政府那里去寻求解决办法，美国人对总统和国会的那份信任，从1966年超过百分之四十跌至1975年的百分之十三。人们摆脱了传统的约束，享受着更广泛的个人自由，如服装、发型、语言、性行为、性别角色等，这些情况都对不确定性的增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许多人来说，脆弱感乃至危机感加大了。著名记者詹姆斯·莱斯顿在1973年1月24日的《纽约时报》这样写道：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经过最长也是最具分裂性的冲突后离开了越南……由于战争，在美国，权力的权威性急剧下降了——下降的不仅有国民政府的权威，还有大中小学、出版社、教会，甚至家庭的道德权威”。许多最具创意的历史学家都回避了